

《摇篮曲》第一部

圣地红烛

韩作黎



7.5
1

韩 作 黎



《摇篮曲》第一部

圣地红烛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圣 地 红 烛

韩 作 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插页2·字数131,000

1985年2月第1版·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400

书号10137·131 定价1.00元



韩作黎

作者小传

韩作黎，一九一八年七月出生于河南邓县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三九年二月入党，一九四一年秋去延安。先后曾在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安塞保育院小学、华北育才小学、北京中直育英学校做过教师、教导主任、校长。任过中共北京西城区区委文教书记、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被选为北京市七届人大代表，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教育局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四十年代曾以黑黎为笔名，发表过《小胖子》、《拦羊的人》、《保育班长》等小说。全国解放后，发表了《长久的怀念》、《可可做饭》、《京京和都都》、《‘小迷瞪’是傻瓜吗？》等一百多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其中，中篇小说《二千里行军》被译成三种外文，在国外发行。

卷 头 诗

这只摇篮啊，
在风雨和战火中摇荡；
这支摇篮曲啊，
用丹心谱写、歌唱。
日月的光辉照耀这篮儿闪光亮；
神圣的使命赋予这曲儿悠扬、雄壮。
它们诞生的圣地和艰难曲折的经历啊，
我们永远难忘！

引 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晚上，阴云低垂，狂风卷着破碎的大字报满街飞舞着。这时，已是十点多钟，杨成章校长挨完“批斗”，从古城大学附属中学走出来。他穿一身旧的蓝布制服，微微低着有些歇顶的头，显得很疲惫。他顺着校门口杨树林边的小路，缓慢地向家走去。

他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了一下，果然有个高个的男青年在身后走着。相距不过几丈远，因为路灯暗，模模糊糊看不清他的脸面。开始，他认为是个不相识的同路人，没有在意；可是，走了半个多小时，那个男青年还跟在后面。他那本已忧郁苦闷的心里，又增加了一层疑虑：这个青年人为什么老跟着自己呢？会不会是坏人？他究竟要干什么？等走到一个离家不远的胡同口，他干脆站住了。那个青年人走近他，竟亲切地叫了声：

“杨老师！”

“你是谁？”杨成章一时还没认出叫他的人。

“我是李彤。”

“噢，是你啊，李彤！我还当是谁呢，有事吗？”

“走吧，杨老师，回到家里再说吧。”说着，李彤伸手要搀扶他。

“不用搀我，没什么，我还可以走。”

李彤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作技术员，是杨成章在延安保育院小学教书时的学生。他父母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一九四九年入城后，他又在杨成章当校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里继续上小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唯独他没人来接。他很难受，就蹲在校园里的一棵松树下面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还喃喃地说着：“回家，回家，我也想家。”杨成章看见了这个情景，心里只觉着热辣辣的，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是杨成章就拉着李彤到自己家里。这天晚上杨成章带着李彤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看了电影，星期日又一起去逛公园，买糖果吃。从此以后，一直到李彤上中学、大学，都由杨成章作代理家长。因此，杨成章和李彤不仅有师生的关系，而且还有父子般的感情。

回到家里，一坐下来，杨成章就问李彤：“天这么晚了，你从城外赶着回来干什么？”

杨成章的爱人郭锦文在一旁插话说：“他还不是惦记着咱们，不放心嘛！”

李彤的眼圈有些湿润，深情地望着杨成章，说：“‘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厉害。最近，到处都听说打人的消息，

今天晚上你们学校又批斗你，我怕你在回家的路上挨人打，所以吃过晚饭，我就进城来，在你们学校大门外等你出来。我没有和你一起走，有意拉开点距离，这样如果有人要打你，我就能及时发现。”李彤说着低下头来，两眼流着热泪，有些哽咽地接着说：“杨老师，要说你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需要批评和检查，那还可以，可是说你是‘走资派’、‘黑帮’，一个劲地批斗你，我怎么也想不通。在延安的时候，你和郭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后接好革命的班。在解放战争中，你们带着我们几百个孩子转移行军，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走了七八个月，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有敌人围追，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这些革命后代，不怕牺牲，受了多少劳累，克服了多少困难啊！有一次杨老师为抢救牲口驮的小同学，把肩膀都压坏了；在敌人围追的时候，郭老师为保护同学爬上黄河岸，大腿上受了重伤。怎么现在倒都成了‘黑帮’、‘走资派’了？”

杨成章和郭锦文听李彤这样说，心情也都异常激动。患难之中见真情。学生是理解我们的。

郭锦文对李彤说：“我是一个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身体又不太好，虽然也挨批挨斗，但还不是重点。你杨老师是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又是重点学校，批斗得就厉害了。批他不突出政治，追求升学率，大搞智育第一，等等。光批斗还不算，最近还常挨打哪！”

杨成章看了郭锦文一眼，带着提醒和制止的口气说：“算啦，你不要说这些啦！”接着，他用沉着而又平稳的语调对李彤说：“不要紧，你不要老是放心不下嘛！民主革命时期，我在延安参加过整风运动，经受过考验与锻炼，最后党中央组织部给我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肯定了工作成绩，宣布政治、历史都没有问题，才调我到咱们那个保育院小学去工作嘛。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又一次考验和锻炼。我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可以批评，我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和检查。但是我不是什么‘黑帮’、‘走资派’，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最后，党一定能对每个人作出正确结论的。”

郭锦文提醒说：“行啦，时候不早了，已经快十二点了，咱们休息吧，明天还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哩！”杨成章答应着：“对，对。”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说：“对待这次运动，我自己给自己确定四条：第一，对己对人力求实事求是；第二，不和群众顶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三，决不自杀，别人打死我，那是他的问题；第四，干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我坚持按这几条做。如果有人把我打死了，李彤啊，咱家你弟弟妹妹还小，你可要同郭老师一起向党申诉，为我昭雪。”

李彤听了杨成章最后的一句话，心里又难受又激动，他说：

“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学，见面都在问你们，都想来

看你们。特别是在青岛当海军的张小毛，在湖南搞有色金属研究工作的周银虎，多次给我来信，要我特别注意保护你们。”

杨成章对李彤说：

“他们俩也给我们来信啦。”

“在延安，他俩可是没少叫你们费心。现在他们让我串连几百个老同学，去和你们学校的人进行辩论！”

杨成章马上严肃认真地对李彤说：“那可不行！你这样干，正好给我们加上一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过！”

李彤说：“我们是自发的，哪能说是你们挑动的！”

杨成章和郭锦文又耐心地对李彤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你说你们是自发的，可谁不知道你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还是你的代理家长？你这样一搞，我和你郭老师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再说，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好的，逐渐会觉悟的；有少数坏人，总要暴露的，群众会识破他们的。”

李彤不吭声，默认了。

“你睡觉去吧，时候不早啦。”杨成章催促着李彤，“我们也要休息了。”

李彤进里间休息了，杨成章和郭锦文也躺下来。

这一对从延安时代开始参加教育工作的中年夫妇，二十多年来同甘苦，共患难，互相支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已是深孚众望的教育行家。对教育界的事，他们颇能洞若观火，但是，此刻，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

乱，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来这样一场运动，他们为何要遭此不白之冤！……他们难以入睡，也难以理出头绪，只好默默地想着……

好一会儿，郭锦文才说：“眼前这些事情简直不能想，还是过去的事，总那么历历在目，恍若昨日，想起那时候，张小毛和周银虎这些孩子，想起过去，就是一种安慰。”

停了一会儿，杨成章也说：“是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那时候你的教育思想还不太对头哪。”

“嗨，谁说不是呢！……”

啊，过去，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

第一章

在延安党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孔窑洞里，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坐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冒着黑烟的煤油灯光，照着他那一张微黑的长圆脸，有些清瘦却显得结实。他头上戴着一顶浅灰色的缀有红五角星的鸭舌毡帽，身穿瓦灰色的粗布棉衣，脚上穿着打有补丁的黑棉鞋。他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小声地哼唱着：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忽然，窑洞外边有人喊：

“杨成章同志！”

他听出是招待所黄副主任的声音。随着他的应声，黄

副主任就引着一位部队的同志走进窑洞来。黄副主任介绍说：“这是周德成同志，在咱们部队任营教导员。”然后，扭头朝着门外说：“哎，银虎呢？过来，过来。”

一个圆头圆脑的孩子，出现在门口。“哦，是你呀！”杨成章走过来拉孩子的手。

周银虎赶忙往黄副主任身后躲。

黄副主任和周德成用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们，说：“怎么，你们认识？”

说来他们的认识还是蛮有趣的。

组织部招待所有个烧锅炉的孙老汉。叫他老汉，其实并不老，五十岁的样子。他不识字，到组织部招待所以后，才开始学文化。别人有别人的学习办法，他有他的绝招儿：凡是住招待所的人，都要来打水吧，好了，不论谁来了，他就把人家的水壶夺过来：

“同志哎，你要打水吗？”

对方肯定回答：“是啊。”

“我给你打，你给我写个字儿。”

“写个什么字儿？”

孙老汉打完开水，才慢条斯理地说：“日本鬼子的鬼字怎么写？”

人家告诉他，他就说：“写下，写下。你写下，我画下。”说着拿出一张毛边纸，让人家写，他在字下面画一个便于记忆的画儿。比方说：汉奸走狗的狗字下面，他就画一只不怎么象的小狗。日本鬼子的鬼字下边，他就画一

个怪里怪气的人样儿，还长出两个犄角来。

昨天，周银虎来打水，同样被孙老汉截住了：

“小同志，你来打水？”

“是哩。”

“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见过你？”

“刚来。”

“好了，把水壶给我吧。”

“我打水，把水壶给你干吗？”周银虎心里这么说，嘴上可没说出来。

“小同志，你识字吗？”孙老汉笑咪咪地问。

周银虎不知孙老汉要干什么，两眼滴溜溜直转，说：

“认识。”

“那好，那好，”孙老汉说着，掏出他那揣在衣兜里的纸，“我念念，你看对不对。”

他是要我教他认字哩！周银虎的鬼点子来了，他要捉弄捉弄这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

孙老汉念：

“日本鬼子，汉奸恶霸，都是坏东西。锅炉、铲子、水壶、油桶……”

周银虎说：“不对，不对，你念错了。”

“哪个错了？”

周银虎说：“你画错了。”他指着汉奸两个字说：

“这念‘铲子’，”又指着“恶霸”两个字说，“这念‘水壶’。”

孙老汉说：“不对吧，我不会画错呀。”

“你这个人，不识字，还不虚心。”

“好好，我重新画一遍。”

老汉低头去画，周银虎赶忙去打水。这当儿，杨成章来了，孙老汉又问他：“老杨同志，‘汉奸’是这么写吗？”

“不对不对。”

“哎，那小同志教我的。”

周银虎想跑，被杨成章拦住了：“哎，你怎么故意教错了。”

“我没教错。”

“嘿，嘴还挺硬，你是谁的孩子？”

“你管不着。”说完，提着水壶跑了。

.....

这会儿，周银虎怕杨成章在他父亲面前讲出这件事。杨成章看到这一点，忙说：“他在外边玩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黄副主任对杨成章说：“德成同志因有紧急任务，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组织上已经决定把他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小学去插班学习。正好，你明天到保育院小学报到，托你带着他去。你看行不行？”

杨成章毫不犹豫地回答：“行，行。请德成同志放心地走吧，就把银虎交给我，我完全负责。”

周德成热情、诚挚地说：“成章同志，那我谢谢你

啦！不过，我告诉你，银虎这孩子，也够调皮了。我老家是山西，这次我因公来延安，路过家乡看了一下，我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和这个孩子。本来我没有打算带他出来，他一个劲儿地说要跟我出来，我都没答应。可他背着爷爷，在我走出村子时，就尾随着我，跟我藏猫猫，一直跟了几十里地才露面，我也不好送他回去了。你看看，他有多调皮！到这里后，我才设法捎信给家里说明。往后，你就是他的老师了，一定要严格地管教他，该打就打，该训就训。”

黄副主任和杨成章都哈哈笑了起来。周银虎更不好意思了。他低着头，身子靠在炕沿边，脚尖不住地跳着地面。

周德成用教训的口气对周银虎说：“银虎，杨叔叔就是你的老师，他带你到学校去上学，一定要听各位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做毛主席和党的好孩子。你听见了没有？”

周银虎点点头，“嗯”了一声。

黄副主任赶忙为银虎说好话：“这孩子还真有办法！你这个当爸爸的是有军事经验的人，他在你后面跟了几十里地你都没发现，这证明他是聪明的，有主意的。”

“我对他这样跟我出来，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他在我后面跟着，总保持一定的距离，看我要回头，就赶快躲起来。”周德成进一步介绍儿子的情况：“他可‘鬼’啦！听他爷爷说，他在村子里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学会埋地雷，炸日本鬼子。有一次让他送鸡毛信给游击队，他学狗